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回歸語文學

沈卫荣 著

Shen Weirong

海外借

今天或若还有人问我“你的心在哪里？”
我的回答必然还是“我的心就在语文学！”

著名藏学家、语文学家沈卫荣教授
追踪国际语文学研究之最新动态
探讨语文学的发展、变化与走向
呼吁知识界回归语文学研究传统
披露取径语文学的学术心路历程



沈卫荣 著

Shen Weirong

回歸語文學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语文学 / 沈卫荣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25-9143-5

I. ①回… II. ①沈…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4129号

回归语文学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沈卫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10 字数 188,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143-5

K·2611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电话: 021-66366565



沈卫荣 1962年生，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西域语文、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的比较研究。历任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研究系合作研究员、德国洪堡大学中亚系代理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共同研究员、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客座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代表作包括《西藏佛教历史的语文学研究》《寻找香格里拉》《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等。

目 录

- 前 言 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 / 1
- 第一章 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
——评 Paul de Man 的《回归语文学》/ 35
- 第二章 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 63
- 第三章 回归语文学
——对佛教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 125
- 第四章 文本的形成与历史叙事的建构
——语文学与藏传佛教史研究 / 173
- 第五章 语文学、东方主义和美国藏学研究
——美国藏学主流的学术传承和学术批评 / 213
- 第六章 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美国本土
藏学批判 / 245

第七章 学术偶像崇拜与学术进步
——我的语文学之路 / 288

结 语 我的心在哪里？ / 321

Contents

Introduc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hilology? / 1

- I. The Turn to Theory as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Review of Paul de Man's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 35
- II. Philology, Orientalism, and "Future
Philology" / 63
- III.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Remarks on the Methodology of
Buddhist Historical Studies / 125
- IV. The Formation of 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Phil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ibetan Buddhism / 173

- V. Philology, Orientalism and Tibetan Studies
—Academic Transmission and Academic
Criticism in the Mainstream of Tibetan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USA / 213
- VI. A Critical Review of Tibetan Studi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Cultural Studies / 245
- VII. Academic Idolatry and Academic Progress
—My Road to Philology / 288
- Concluding Remark What does My Heart
Say? / 321

前 言

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

—

2008年10月，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开幕式上，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Ernst Steinkellner教授（1937— ）作了题为《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有关方法论的几点意见》（What can we learn from phil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remarks）的主题发言。大家都知道，Steinkellner先生是世界佛学耆宿、语文学大家，维也纳/京都佛教语文学学派的领军人物，佛教认识论（量学）研究的顶级专家。他用语文学方法处理梵、藏文佛教文献之精致，已成世界同行难以企及的标准。请他来谈语文学的方法，可谓适得其人。出人意料的是，Steinkellner先生没有多谈语文学和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关系，却大谈了一通语文学方法对于实现人类和平、和谐与幸福的意义。他指出：语

文学是一门研究文本的学问，其宗旨是正确理解文本之本来意义。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赖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就是需要人们正确理解个人、社会、国家互相发出的各种文本和信息。因此，语文学不仅是一种处理文本的学术方法，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是指导我们如何理解他人、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一种人生哲学。

大家知道，语文学通常被归属于小学、朴学之流，与理学、哲学相对。在中国学界，它常被人误以为是一门从事实证



图0-1 著名佛教学家、维也纳大学荣休教授 Ernst Steinkellner (1937—)

研究的技术活。我本人从最初进入学术界开始就偏爱语文学，但受这种观念影响，有时亦会觉得自己所做的学问远离义理之学，无法直接参与学术和时代的“宏大叙事”，心中有所不甘。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Steinkellner先生的报告，如醍醐灌顶，令我恍然明白过来，原来语文学不仅是正确处理古典

文本的学术方法，而且也可以是关乎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人生哲学。真幸运当今学界还有像Steinkellner先生这样祭酒级的人物，不但能将作为朴学的语文学的精美发挥到极致，而且还能跳出象牙塔，将作为理学的语文学的意义说得如此精当，将职业和人生、世界结合得如此完美。

二

Philology，我习惯将它译为语文学，以前有语言学、言语学、语学、古典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日本学界普遍采用的译法）、小学、朴学等种种不同的译法。最早将这门西方学问在中国学界大力推介的应数傅斯年先生。他在“中研院”发起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的“语言研究”指的并不是主要研究语言表达之形式（the form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的linguistics，即“语言学”，而是同时研究语言表达之意义（meaning），将“语言学”和“文字〔文学、文献〕研究”（literary studies）结合起来的“语文学”（philology）。今天“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作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中研院”又另设“语言研究所”，与“史语所”区别开来，这或许说明“史语所”至今依然遵循傅先生当年建所时的宗旨，重视“语文学”

研究。^①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那篇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宣言中，傅先生对“语文学”和将这门学科引进中国的必要性做了说明，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随着梵文的发现和研究，欧洲古典语言学在18、19世纪之交发展迅速，其中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研究最有成就，带动了其他语支的研究，导致研究语言流变、审音的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2. 西洋人利用“语文学”方法，解决了中国人不能解决的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特别是中国人所忽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所以，如果中国学是汉学，那么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就是虏学，而汉学之发达得借重虏学。

3. 中国人没有“语文学”这个工具，所以历代音韵学者审不了音，甚至弄不明白《切韵》，一切古音研究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人必须借助“语文学”这个工具，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研究汉语、西南语、

^① 关于语文学与史语所，乃至民国学术的关系，详见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6月，第375—460页。

中央亚细亚语和语言学。^①

傅先生的上述意见无疑对“史语所”的规划和引进“语文学”方法、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起过重大的作用。但要真正理解傅先生当时提出这番意见的良苦用心，我们或当对西方“语文学”发展的源流和当时西方汉学研究的状况有所了解。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给Philology找到一个大家认可的译名，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很难给Philology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有检讨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到底什么是Philology？Philology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philologia，它由philos和logos两个词组成，前者意为“亲爱”、“喜爱”、“朋友”等，而后者意为“言语”、“语言表达”和“推论”等，合起来之大意为“学问之爱”、“文学〔献〕之爱”等。Philology最初表示的是一种对学问、文献，以及推理、讨论和争论的热爱，与热爱终极智慧的哲学（philosophos）相对应。不过，古希腊传统中这种宽泛的对“学问和文献之爱”（love of learning and literature）后来渐渐被专业化，专指对语言的历史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到了19世纪，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研究在欧洲学界兴起，渐渐成为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

Philology的主流。“历史语言学”也称“越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s),总括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词源学(etymology)、方言学(dialectology)、音韵学(phonology)、形态学(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等,重视理解发音、音变规则(sound laws)和语言变化(language change)的研究。在欧洲的学术传统中,Philology有时是“历史语言学”的同义词。傅先生文中提到的研究语言流变、审音的比较语言学即指“历史语言学”,是故,中国老一辈学者亦多半称Philology为“历史语言学”。但确切地说,“历史语言学”只是Philology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分支而已,语文学的范畴远远超越语言学。除了上述这些语言学研究内容以外,Philology还应包括对语言的历史和文字[学]传统(literary tradition),以及对古典文献(ancient texts and documents)的研究。语言学是对语言的研究,而“语文学”则是对用文字记录下来语言,即文本的研究。

傅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到的“欧洲古典语言学”实际上指的是“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它与“历史语言学”几乎就是同义语。“古典语文学”一开始是对古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的语文学研究,以后扩展到对所有欧洲、非欧洲和东方古代语言的研究。16世纪初,欧洲语言学家发现了梵文和古代欧洲语言的相似性,于是推想所有语言可能都来自一种

共同的祖先语言，即所谓“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这触发了古典语文学研究的热潮。“古典语文学”主要是一种“比较语言学研究”，重视各种语言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语言研究，而是要通过研究各种古典语言间的关系和各种异种语言来弄清古典文献的来源，并理解和解读这些古代文献。“古典语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欧美学术界有持久的影响力，多数名牌大学中曾经有过“古典语文学”或者“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系和专业。



图 0-2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傅斯年（1896—1950）

除了对语言变迁历史的研究之外,“语文学”格外重视对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通过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指文本对勘和文本的比较研究),还原文本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以重构和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语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内容。所以,“语文学”特别注重文本的发现、编辑、整理和解释,遂有所谓“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之称。今天很多人将“语文学”径称为“文献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文本语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它起源于西方语文学家对《圣经》的研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宗教改革时期。语文学家们试图通过对存世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作比较研究,以重构《圣经》最本初的文本(读法)。这种以重构原始文本为目的的文献研究方法很快被应用于对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文本的研究之中,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流。这种“文本语文学”留下了一个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不衰的学术传统,即制作文本的“精(合)校本”(critical edition)。一个“精(合)校本”旨在提供一种可靠的、重构的原始文本,要求作者将同一文本的所有存世稿本收集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其用作底本的那个文本的脚注中将各种稿本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差异之处一一标注出来,使读者能对整个稿本的面貌和流传情况有通盘的了解,从而对各种稿本间出现的歧异之处的正误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与这种“文本语文学”相伴随的还有一种被称为“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注重考证文本的来源、成书的时间和作者的身份等，旨在能将一个文本置于还原了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由于“语文学”关注的因素大多数与对一个文本的解释有关，所以在“语文学”和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之间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界线，二者最重视的都是如何正确地理解文本及这个文本所要表达的思想。

19世纪，“语文学”是欧洲学术研究的主流，也是科学化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格说来，“语文学”是近代以来所有人文学科的源头。而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就是一种最典型的“文本语文学”的研究，所以也被统称为“东方文本语文学”（oriental textual philology）。它的所有分支学科无非都是用“文本语文学”的方法，对某个特殊的地区、民族的文献、文本所进行的语文学式的研究。具体到汉学研究，19世纪后期正是汉学在欧洲学术机构中登堂入室，正式成为一门综合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和历史的现代专门学科的关键时刻。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跨学科的学问，汉学研究并没有自己特有的学术方法，汉学家不管是研究语言、文学、哲学，还是研究宗教、艺术和历史，其最基本的学术方法就是“文本语文学”。按照傅斯年